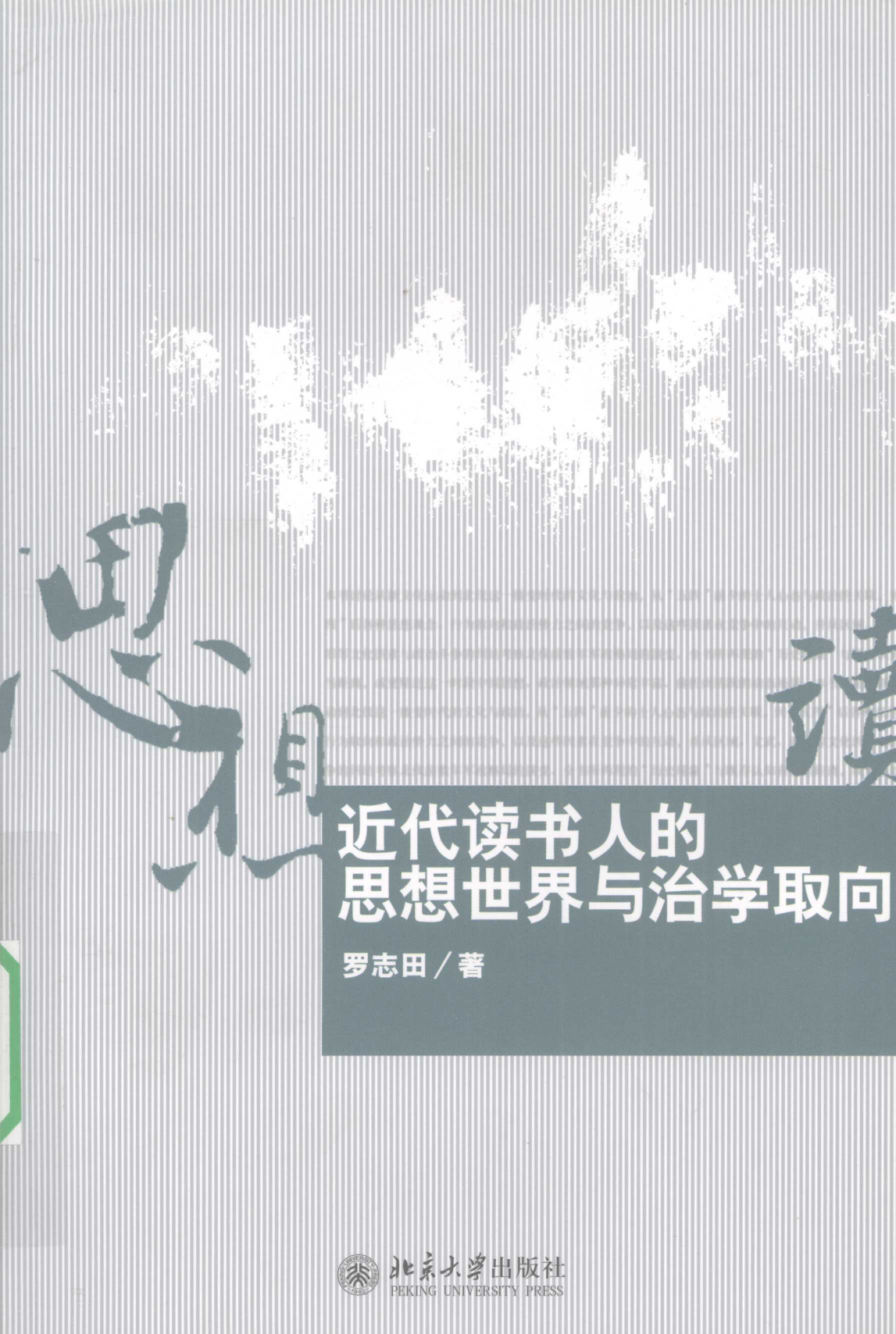




思想

讀

近代读书人的 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罗志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近代读书人的 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罗志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罗志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301-14682-8

I. 近… II. 罗… III. ①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中国-近代②知识分子-治学精神-研究-中国-近代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7562 号

书 名: 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

著作责任者: 罗志田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682-8/K · 056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zw@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9.75 印张 269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自 序/1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

——侧重梁启超的观念/30

1. 天下、中国与世界/32
2. 厘清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42
3. 余论/50

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55

1. 外在的“世界”/57
2. 梁启超在世界与中国之间的徘徊/60
3. 民族主义兴起而世界主义余波不衰/72
4. “跳进世界流去”/84
5. 中国人与世界人/92
6. 余论/99

士变:20 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104

1. 引言/107
2. 革命的时代/110
3. 面向未来的广义大革命/120
4. 革命者互相革命/128
5. 仍要“继续革命”/134

6. 余论/140

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142

1. 有计划的死:梁济的忧虑和民初世风/143

2. 社会反响:菁英忽视而民众缅怀/150

斯文关天意: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对对子风波/161

1. 语境:国难与国性/163

2. 本事:对对子引发的诘难/172

3. 出题者的答辩及其旨趣/184

4. 余论/194

无名之辈改写历史: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

题争议/199

1. 大学考试成为社会性表述/201

2. 作文题遭遇揭示的时代思想/214

章太炎、刘师培与清代学术史研究/223

1. 以三百年论学术/224

2.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230

3. 人物取舍与经史视角/240

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248

1. “不古不今之学”的既存解释/251

2. “不古不今”的古典与今典/254

3. 中西体用与“咸同”、“同光”/260

4. 法后王而不道久远之事/278

5. 结语/283

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286

1. 内篇: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290

2. 外篇:前后左右则史无定向/308

自序

把近代中国称作“过渡时代”，曾是梁启超十分爱说的话，他特别强调那是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段。^① 清末民初之际，至少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或非梁启超莫属。他的很多见解，不论“正确”与否，现在都还有着生命力。^② 中国的近代真是一个“过渡时代”，其过渡状态恐怕到现在都仍在延续之中；而且是全方位的“过渡”，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续”。^③ 后现代学人所乐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充分。

那的确是个特殊的时代。从时空角度看，在近代中国这一界域之

①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190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27—32页。

② 说详本书《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型》。

③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27页。

中,产生了很多此前和此外很少见到的现象。^① 这些特异之处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中外史家的目光,也使多少史家困惑。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考察分析似乎仍着重在与过去特别是外国相近趋同之处,很多往昔和异地少见的面相,尚未得到关注,还等待着研究者更深入的挖掘,并将此绚丽多姿的奇景揭示出来,展现给对历史充满兴趣的读者,包括非专业读者。

本书原拟书名有二,其另一书名是“士人与学人:近代读书人的两个面相”。当时颇不能决,后商之于吾友潘振平。振平兄以为还是现存书名更合适,盖所谓士人、学人、面相等,一般读者或易生困惑。他是资深出版人,我相信他的判断。序言大体写成后,因文中关键词的翻译,请教吾友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他认为文中所用读书人、士人和学人这些分类,特别是其间之异同的辨析,不论用什么英文字词,都和英文既存中国史论著的用法有些不同,或生误解。后来又经过一次面谈,感觉即使中文词汇本身,也需有所说明。在此先向二位致谢,并作简单说明如下。

本书所说的“读书人”,略同于今日一般史学论著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尽量不用“知识分子”,一是因为这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后出的外来词,在本文讨论的时段里,至少前一段时间,这个词汇本身尚未出现,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自己并无这样的身份认同,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接受这个认同。二是中文世界里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是从小字面意义理解和使用外来词的,把 *intellectuals* (或其他西文里相应的词)译作“知识分子”可能有些误导,至少在用于指称中国读

①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家庭”这一多数人类社会历来最看重的“温暖港湾”,在近代中国却成为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典型负面象征:“家庭”忽然失去了其在过去和外国都曾具有的广泛社会功能,特别是对其成员的护佑;却承载着大量新增的宏阔政治负担,被视为其成员救国兴邦的桎梏。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在精神物质两层面皆已确立菁英地位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通常最乐于维持现状而最不倾向变革的群体,其中许多人却长期向往和憧憬着一个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革命,并不断倡导和鼓励各类革命。前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妍杰同学的研究题目,后者可参见本书《士变: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

书人方面。原因是：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术性或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可能是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可以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这个问题较大，我会另文专论。但有一点很明确，以前读书人所“读”之“书”，与后来日益专业化的“知识”，恰较少关联；换言之，“知识”，尤其专业化的知识，不是他们学习的主要目标。在近代这一过渡时代，这样的状态虽有断裂，仍在延续。因此，用“知识”来界定这一群体，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或者还是“读书人”更能传达其原初的涵义。^①

当初所以拟出那一弃而未用之书名，就是感觉其中的意思可以反映本书所处理的菁英与边缘读书人在过渡时代中的一种共同意态，即始终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

过渡时代的士人学人与学术思想

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也包含从政议政，这在以前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传统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② 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是近代的新事物，到民初才开始得到提倡，但上述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包括其中的趋新者）。身处过渡时代的读

^① 不过，后来的教育体制的确是在传授和学习“知识”，所培养出来的真是所谓“知识人”。故对本书中那些出于新教育体制的学生群体，我仍沿用“知识青年”的称谓。

^② 原文是：“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张之洞：《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4册，545页。

书人,确常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两种身份认同之间,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①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很多读书人的确希望作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但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任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②与前不同的是,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学人”与“士人”大体可以说是“学术”和“思想”的载体。我们今日意义的“学术”与“思想”,恐怕都是近代才“兴起”的概念,甚或是充满外来意味的概念。而其在兴起之初,确曾关联密切,难以区隔。实际上,若徘徊于士人与学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之间,也很容易产生一种连带的思路,即在思考和表述中把“学术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学术”和“思想”两者相加而成的一个混合词。

把“思想”和“学术”混为一谈,大致也以梁启超为始作俑者。梁氏在清季所写的那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当时即广为传播,

① 按近代的“过渡”不仅体现在古今,也体现在中外:西方也有所谓社会责任意识明显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但仍是一种藕断丝连的区分(今人在“知识分子”之前加上“公共”的定语,以“公共知识分子”来表述那种侧重社会责任的读书人,就是两者之间实际难以区隔的表征)。这类观念也逐渐进入中国,给那些本已在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读书人增添了一分困惑。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本拟不谈政治,后又转而谈政治,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好几个外国人在那前后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的良心”之责任。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89—190页。类似现象我已在多处言及,此不赘述。

②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394页。

后来更有持续的影响。正如胡适指出的,梁是那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曾经“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的胡适后来回忆,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①

那是一篇写了一两年也没完成的长文,写成部分约有八九万字。梁启超在其中虽有几次将“学术”与“思想”分开来讨论,如“但求吾学术之进步、思想之统一”;“由思想发为学术”一类,但大多数时候,文中的“学术思想”就是一个不分的整体。^② 胡适回忆中的用语,大体也在表述相类的意义,最能体现“学术思想”一语在当年既模糊又涵盖宽广的特征。^③

与此同时,张之洞所说的国家兴亡“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的观念也在发生过渡性的转变。梁启超曾以为,“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④ 这比较像前引张之洞表述的传统观念,但他在大约同时又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⑤两说之间显然有些冲突,而中国与泰西的不同,恐怕才是其关注的重心。梁氏似乎在暗示,中国后来之所以不那么“进步”,即因其学术思想未能影响政治,反为政治所左右。

梁启超的观念影响了很多入;或也可以说,在那前后有很多人分享

① 胡适认知中梁对胡的影响,均见《四十自述》,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49—50页。

② 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引文在4.8页。

③ 今日一般虽已将学术和思想两分,但研究到近代时便发现两者很多时候确实难以区隔,一方面因为时人往往不加区分,另一方面也常能看到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沿着思想、学术各自的内在发展理路进行探索和梳理当然是必须的,同时也可以从两者互动的角度构建某种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④ 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

⑤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38页。

着类似的思路。杨度就认为：“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有学术而后有政治。”^①《国民日报》一篇不署名文章则将思想与学术区分，提出“天下有思想而后有学术，有学术而后有政治，政治之不善，原于学术者也；学术之不善，原于思想者也”。^②该文尽管有这样更细致的区分，但整体上还是主张思想学术的优劣影响甚或决定着政治的好坏。

马君武曾专文讨论“新学术”与“群治”的关系，认为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之中，所谓适者生存，就体现在“能发明最新之学术，而进化不已”。惟“文明人种独有新学术，而野蛮及不进化之人种无之”。世界历史上“当每一新学术发明之时，则必震撼一切旧社会，而摇动其政治经济等界之情状”。其势力巨大，随之而变则胜，不变则不胜。^③邓实在大约同时也在强调，“今日之急务”是以学术思想养成国人之政治思想。^④而刘师培夫妇稍后也说，“中国一切之政治，均生于学术”。^⑤刘本人更曾进而申论“学术专制与政体之专制相表里”。^⑥

而且，时人对“学”的关注，已在一种新兴的世界竞争视野之下。《游学译编》一篇不署名的《与同志书》说：“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该文指出：当时世界竞争已剧烈到生死存亡的程度，竞争方式不外兵战、商战和学战。

① 杨度：《〈游学译编〉叙》（1902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以下径引书名），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249页。

② 未署名：《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735页。

③ 马君武：《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1903年），《马君武集（1900—1919）》，莫世祥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87页。

④ 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光绪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93—94页。

⑤ 震（何震）、申叔（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1907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947页。

⑥ 刘光汉：《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2年（1906年）第5期，“学篇”7页。

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①《江苏》上署名“云窝”的文章也说，今日生存竞争“利害之烈莫甚于学战，胜则为全球主人翁，败者入自然淘汰之旋涡，而种族渐归断灭”。从表面看，“兵战、商战、农战、工战”皆“足以兴人国亡人国”；其实这些竞争的胜败“无一不以学战为总枢纽”。^②

“学战”说在那时非常流行，很可能受到西方文化竞争观念的影响。^③当年多数人都与上述诸公相类，特别强调“学”的决定性地位。而章太炎则是个例外，他曾通俗地指出：“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何以见得呢？你看别国的政治学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那个政治上的英雄伟人，也不见他专讲究政治学。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书籍上得来的少。就像中国现在，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章氏后来也承认“文章与风俗相系”，然强调：社会风俗之根株“皆政事隆污所致”。近代中国出现“重文学而轻政事”的弊端，是受了日本人治中国史的影响。^④

按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与泰西的不同，即所谓“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本也接近章太炎的看法。但太炎显然是要从根本的通例层面否定“学以致用”的取向，故强调这是中外皆然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章氏似乎是在提倡某种现代意义的“学术独立”，特别是独立于政治；然而这一思路后来却成为参与实际政治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即只有从政治上根本改变现状（即更换政权），才能谈到其他方面的转变。而另一些提倡思想改造者则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以再造中

① 未署名：《与同志书》（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393—394页。

② 云窝：《教育通论》（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551页。

③ 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④ 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章太炎的白话文》，陈平原选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54页；《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15日），12页（文页）。

国文明。

章、梁的观念虽对立,其思路仍相近。不论是学术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决定学术,最后仍落实在具体的个人和群体之上。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四民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士人原本具有的楷模地位动摇,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梁启超当年已感不能自圆其说,遂提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①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也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章太炎大致分享着类似的思路,不过转而寄希望于“革命”。他说:“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②

然而,人民能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及革命是否补泻兼备之良药,在当时仍是充满想象的未知因素。《外交报》一篇不署名文则提出:“宪政之能立不能立,则不系乎政府,而系乎国民。且并不系乎今日之国民,实系乎先民之政教。先民政教中,其犹有善因耶,则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其竟无善因耶,则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③此处仍隐约可见梁启超《新民说》中对“民”的强调,但梁氏以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④而此文则认为当时的国民仍在“先民之政教”的影响之下,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着国民的素质及宪政的成败。

在趋新大潮波涛汹涌的时代,如此看重传统的制约力,是相当少见

①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页。按这也反映着过渡时代“民”意识的上升,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5月),《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203—204页。

③ 未署名:《论立宪与外交之关系》(1907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577页。

④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2页。

的。后来五四新文化人或反向传承了这一认知,特别强调以破除传统为救亡图存的要素。当然,新文化人无疑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前引梁氏关于“学术思想为母,风俗政治皆其子孙”的观念,很可能鼓励了新文化人从“学术思想”这一根源处反传统的取向,也就是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①而梁氏只要能“新民”就可以“新”一切的主张,大致也是新文化运动时借改造国民性以改变中国这一取向的思想资源。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在西潮冲击下的“觉悟”分三步,即学术、政治和伦理,后者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认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照此看,他所说的“伦理”似略同于“根本思想”,而且他确实寄希望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的变更。不过,陈独秀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细致梳理学术、政治和伦理(根本思想)的递进关系,进而提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必须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态度,全面彻底地“取而代之”。^②

梁启超稍后总结说,时人因辛亥鼎革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③他所谓“全人格的觉悟”,非常像陈独秀所说的“最后之最后”的伦理觉悟,多少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倾向。^④随着东西“文化”的对比和对立逐渐成为共同关

① 参见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收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68—174页。

②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答易宗夔》(在《新青年》刊发时原署名胡适、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卷,175—179、224—229、408页。

③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5页。

④ 参见罗志田:《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6月)。

注的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中国文化”来表述那已被负面整体化的中国传统。

前引胡适所说梁启超的文章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亦即把“四书”、“五经”作为“学术思想”的对比参照物,就很有提示意义。在胡适说话的时代,“四书”、“五经”本身也经历着过渡——从曾经规范人伦的道义载体变为过去“学术思想”的载体,以及当时“学术思想”的对象,已经是一个充满颠覆意味的转变了。

而且这是一个有意促成的转变,曾为晚清改革重要推手的黄遵宪,对20世纪初年全国“兴学校”的风潮甚为不满,颇感其举措“皆与吾意相左”。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①这一表述非常重要,表明黄遵宪等人已将推行“去经典化”落实到意识层面,要把经书从“经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或“切于日用”,或“归入专门”,而不复具有规范人伦的指导意义。^②

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学术思想”与“风俗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思考的问题,恰是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努力的结果。^③以前“风俗政治”都在“道”的指引之下,“道”的意义虽有灵活波动的一面,但大体意旨仍是明确的。重要的是“道”以经典为载体,若对“道”的意旨有任何不明确,正可从经典中寻觅。“去经典化”之后,“风俗政治”便处在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之下,而“学术思想”则扮演着一一种身份似明确而

① 黄遵宪致梁启超,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黄遵宪集》,吴振清等编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491—492页。

②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且牵涉甚广,当另文专论。

③ 《国民日报》曾刊发一篇不署名的《道统辨》之文,一再凸显“道统”和“学术”的新旧对立,恰最能体现二者的承接关系。参见未署名:《道统辨》(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735—739页。

意义不确定的角色：它此前基本可以说并不“存在”，遑论是否能影响政治；现在一部分人赋予它以前经典所行使的功用，^①然其究竟是否能够承担，以及应怎样完成，的确都还是问题。

经典淡出后读书人的责任与困惑

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影响极为深远，虽然其表现可能是逐步的，一开始未必那么直接和明显。在经典淡出之后，不论新兴的“学术思想”能否承袭以前经典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可能都需要重新界定、重新认识，甚至读书人的社会形象也会发生某种转变。伴随着“去经典化”的推行，从19世纪末开始，近代中国可见一个日益加剧的读书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进程，造成了读书人形象的负面转化。^②

梁启超在主张人民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同时，就曾指责中国“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③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想了”。^④不久梁氏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对方（革命党人

① 不仅所谓“学术思想”，在经学边缘化之后，史学也曾一度被赋予一些外在的功能，获得某种程度的“道德提升”。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汉学研究》（台北），第15卷第2期（1997年12月）。另一个在更小的范围（主要是菁英圈子）但更长的时间里部分取代了“道”的传统功能的，是被象征化了的“科学”。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果同学提示的。

②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收入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33—50页；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91—241页；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收入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275—302页。

③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89—90页。

④ 白话道人（林瀚）：《〈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03—605页。

和戊戌党人)不道德。^①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攻击性论争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的破坏性;盖若双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据,则其在“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更成问题了。

但梁氏自己对“民”和“士”的态度很快有所调整。他在写《新民说》之前曾向往一种两全的境界,即以“多数之国民”的主动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以获取“一国之进步”。^②到1907年,他已将中国宪政成立与国家兴亡的希望寄托于“中流社会之责任心”。盖“中流社会,为一国之中坚;国家之大业,恒藉其手以成。此征诸各国,莫不有然,而今日之中国为尤甚”;若“一国中有普通知识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会,能以改良一国政治为己任”,则国家前途便有希望。^③

到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终于回归到四民之首的士人心态,承认“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其撑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此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而“能得多数之景从者”时,国家就昌盛。他确信,只要中国“能有百人怀此决心,更少则有十数人怀此决心”,而并力与恶政府、恶社会以及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中国就不可能亡。他进而一面代国民立言,以为“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一面更自己表态说:“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④

这里的转变至为明晰:此前是想以“多数之国民”来“驱役一二之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40页;章太炎:《革命之道德》(1906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513页。

② 梁氏并指出,若反过来,“其主动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强求多数之国民以为助动者,则其事鲜不败”。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32页。

③ 梁启超:《政治上之监督机关》(1907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26页。

④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34—36,39—40页。